

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络

——以泰国为例的研究

王苍柏

引言

战后,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东亚^①现代化成就,已经引起了全球瞩目,并引发了广泛的学术探讨。人们发现,与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东亚地区,同样产生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而对“西化”的现代化理论和“悲观”的激进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②。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都对东亚崛起提出了解释模式,然而,作为东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华人,其经济成就却始终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用来解释东亚经济成就的理论,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制度学派,尽管都有其说服力,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以国家为取向,因此难以用来分析海外华人这样的跨国种族集团的经济活动。第三种关于东亚成功的观点——文化论——将华人种族和文化作为他们商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也不足以提供圆满的解释^③。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华人企业家们成功编织了经济网络。这一概念指建立在血缘、地缘、友谊和其他内聚性因素基础上的那些经济纽带。依靠这种关系网,华人得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成就。关于华人经济网络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问世^④。然而,大多数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对二战后华人经济活动的考察,或囿于诸如家庭企业、信用和宗族等概念的分析上。东亚地区华人经济网络的历史起源、结构、特征和本质,则始终处于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因而,华人经济网络这一课题,尚有待全面、系统的阐述。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华人经济网络作一个长波的历史考察,并尝试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在研究范围上,以泰国华人^⑤为例;在时限上,集中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中期到却克里王朝拉玛五世统治结束(即17世纪到20世纪10年代)。在该时期,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经历了从孕育到形成、从国内到跨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东南亚各华人社会中较具代表性。尽管泰国华人经验的适用性有着一定的局限,但相信本项研究对于全面地理解华人经济网络将不无裨益。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第一,通过对泰国华人经济活动的考察,探寻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历史逻辑,进而证明华人经济网络是东南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华人文化因素等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所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用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的观点才能正确把握。第二,深入分析华人经济网络的结构和特征,及其在泰国现代化起动阶段的作用。证明根植于东亚和华人社会传统的华人经济网络,是东亚社会独特的现代化方式,从而对东亚现代化理论提供某种补充。

本文将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历史考察。理清泰国华人经济网络成长和形成的历史脉络,并概括各个阶段的特点。(二)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诸因素分析。(三)华人经济网络结构、主要特征及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四)结论。(五)本文的

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着眼点。

一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历史考察

经济网络是在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并不单单是现代工业化条件下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繁荣的地中海商业往来就曾催生了一个比较典型的经济贸易网络。在东方太平洋地区,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以中国为中心,从东北亚的朝鲜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在地理分布上呈半环型,其轨迹延伸入印度洋海域,可以称之为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④以繁荣的中国古典农业文明为依托,该贸易网持续了十数个世纪,影响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框架之下,中国先民架舟泛海,来到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逐渐建立起海外华人的经济网络。

(一) 孕育期: 1767年以前泰国华人的经济活动

中泰两国的交往始于我国的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从雷州半岛出发,沿印支半岛海岸西行,过克拉克地峡,到印度东南部的“黄支国”出访,其间经过的“卢没国”和“谶离国”,据专家考证,就在今泰国南部地区。^⑤虽然从上述记载中不能得出中国人已在泰国生活的直接证明,但显然当时已经出现了从中国到东南亚的航线,并形成了“蛮夷贾船,转送至之”^⑥的交通机制。除使臣之外,“商贾如遇风暴而留居其地,亦不能定为必无之事也”。^⑦隋唐以降,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高度发展的成熟时期,交往范围日益扩大,特别是宋代指南针出现后,航海技术有了巨大提高,中国商船的足迹遍布南洋各地。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位于中国通往印度、阿拉伯的海路通道上,几乎可以肯定,在十三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1238-1438)建立之前,中国商人早已定居在暹罗湾沿岸的市场和港口了。^⑧

素可泰王朝与我国元朝政治、贸易往来密切,多次互派使节。素可泰国王拉玛甘亨(Rama Khamheng)曾于1294年和1300年两次到大都朝见中国皇帝。据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曾把一批中国瓷匠带回素可泰,即是日后著名的宋加洛瓷的始祖。^⑨这些瓷匠就是有记载的第一批定居于泰国的华人。

1438年,新兴的阿瑜陀耶王国(1350-1767,又称大城王朝)吞并素可泰,建立了一个地跨湄南河中下游和马来半岛部分地区的强大的统一的国家。阿瑜陀耶王朝不仅保持了与中国明王朝频繁的朝贡贸易往来,而且吸引了来自日本、印度、阿拉伯和西方等国的商人、工匠。首都大城以“东方商埠”而闻名,是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集散中心。^⑩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泰国已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据《海语》记载,首都大城“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又说“国无姓氏,华人流寓者始从本姓,一再传亦亡矣”。^⑪奶街是大城一条河流的名字,华人沿河构筑俗称“高脚屋”的半边临水,半边靠岸的房子,住人兼做生意,奶街遂成为当时大城繁华的商业区。除奶街外,大城内还有五处华人定居点,分别是三马区、米线街、拉空猜北空哒叻、沓刺佛寺街、水上市区华人定居点。^⑫除首都大城以外,华人分布在泰国各口岸及马来半岛等地。到17世纪,北大年“中国人的数目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数”。^⑬“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⑭旅泰中国人的数目,据史金纳估计,“17世纪后半叶的暹罗,至少有华侨一万人”。^⑮泰国学者沙拉信·威拉蓬也认为,“17世纪90年代初,大城的中国人已达3000人,也许在全国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华人……是时全暹罗的人口不会超过200万人”。^⑯

17世纪的华人以大小商人为主体的,在首都和各主要港口从事商业,或经营泰国与中国、日

本的海外贸易。此外,华人中还有许多工匠、蔬菜种植人、养猪人、少量的医生和戏剧演员。^⑩

但是,直到17世纪下半叶为止,华人在泰国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只是阿瑜陀耶的众多外国侨民中的一支。^⑪然而,发生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几件事情不但改变了泰国的历史轨迹,也极大地影响了华人的经济生活,从而为华人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首先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爆发。这一年主张与法国合作的纳雷王病逝,以象队统帅帕碧罗为首的亲王、大臣们发动政变,处死了代表法国利益、担任外贸总监的康士坦丁·华尔康,率领军队击败法军,迫使法国全部撤出泰国。^⑫1688年革命使英法在泰国的贸易地位中断了一百余年,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泰国贸易和政治中的重要性也很快丧失殆尽。“几乎同时,日本也封闭其对外贸易之门,而大城的日本人居住区也告衰落。但这些事变对居住在暹罗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影响。”^⑬

其次,王室垄断贸易制度的确立。随着封建王权的不断集中,到17世纪初巴塞铜(Prasart Thong)和纳雷(Narai)王统治时期,泰国王室垄断贸易逐步形成。所有的贸易活动都在王室的严格控制之下,泰国国王很快“认识到利用中国商人来进行皇家贸易会更加有利这一事实。因为中国人都是最有经验的航海家,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和大部分中国口岸接触。”^⑭因此,“王室垄断贸易的维持,使国王依赖中国人,他们充当各种角色:皇家代理人、王库保管员、会计、船长、水手和海关官员。”^⑮王室垄断贸易“使中国人的帆船贸易得以战胜来自其他集团的竞争,并最终建立了在国家外贸当中的霸权地位。”^⑯

第三,中泰大米贸易的出现和发展。18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为了缓和粮食紧张局面,清政府开始鼓励从泰国进口大米。^⑰从雍正初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中泰大米贸易的繁盛时期。泰国国王频繁地向中国派出朝贡船只,并更多地依赖擅长经商和航海并熟悉中国市场的华人,经营中泰之间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大米贸易刺激了樟林港等中国东南沿海一批中小港口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华商造船从事大米贸易,形成一股清初中国人移民泰国的高潮。1821年前后,华人在泰国建造的帆船已达136艘,其中有82艘是从事中泰之间的贸易,另外54艘是到东南亚其他地方贸易,所有船只的吨位共计39000多吨,船上配备的人员几乎全是华人,估计有八九千人之多。^⑱

这些事件一方面导致泰国对欧洲人采取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⑲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人经营王室直接控制的垄断贸易的传统,其直接结果是华人社区规模的扩大和华人在泰国经济生活中优势的形成,“因而十八世纪的暹罗是南洋华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⑳就是在这一时期,华人经济网络发展的条件逐渐成熟,随着一个新的王朝——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这一网络迅速成长起来。

(二) 成长期: 1768年至1850年

从吞武里王朝建立到却克里王朝(又称曼谷王朝)拉玛三世统治结束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泰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的时期,也是华人经济网络迅速成长的时期。

1 泰国王室的政治经济政策及华人社会的新变化

首先,吞武里王朝和却克里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鼓励华人入境的措施,使“暹罗中国人口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构成上都起了剧烈的变化。”^㉑

1767年,郑信^①经过驱缅复国斗争,重新实现了泰国的独立和统一,被拥戴为王,吞武里王朝(1767-1782)由此诞生。郑信时代及却克里王朝初期,旧都大城和许多城镇毁于战火,居民被驱往缅甸,劳动力严重不足。而此时中国华南地区人口膨胀,粮食匮乏,灾害不断,“引起向外移民的一种强烈的冲动”。^②从达信王统治时期开始,华人入境趋势不断上升,并持续到19世纪。“据统计,从1820年到1850年的三十年间,中国沿海地区每年约有15000多居民乘船进入泰国。”^③到19世纪中叶,泰国中国人口已达到30万人,占泰国总人口的5.8%。^④

19世纪,潮州人在泰国华人人口当中的比重有了惊人的提高,成为泰国华人最主要的语系集团;而在18世纪作为第一语系集团的福建人的比重急剧下降。“19世纪时所展示的移民新类型,已塑造了目前泰国华人人口的语系集团的构成。”^⑤各语系集团移民泰国的历史顺序及数量对比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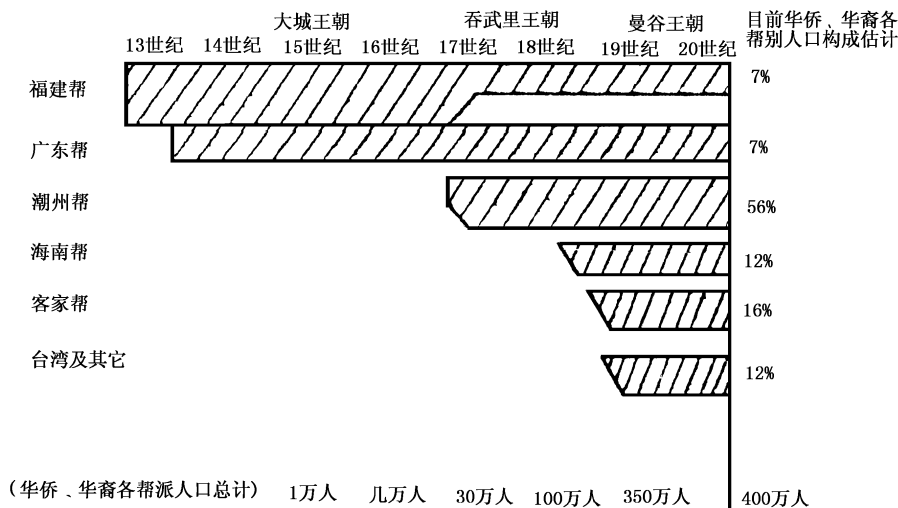


图1 泰国华人各语系集团人口构成

资料来源:市川信爱:《泰国华侨社会的特点和各种华侨帮派的形成》,《南洋资料译丛》,1981年第3期,第76页。

其次,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成为达信时代和却克里王朝初期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在吞武里及却克里王朝初期,泰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急需大批生产和生活物资;国家财政空虚,而传统的财政手段如各种税收、徭役等,战后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起来。因此,郑信很自然地继承了前朝的中泰贸易的遗产,并将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拯救国家的一剂“灵丹妙药”。^⑥吞武里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郑信就派华侨船商陈美生携文书到北京朝见乾隆皇帝,请求敕封,并恢复朝贡贸易。1781年,郑信派出11艘商船的庞大使团,重新启动了中断数年的中泰朝贡贸易往来。^⑦同郑信一样,却克里王朝拉玛一世继续依靠与中国的贸易来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⑧在却克里王朝初期的1782年和泰国皇家国营贸易停止时的1854年之间,派往中国的贡使共为35次,平均每十年4.9次,这是空前高的纪录。^⑨克劳福德指出,泰国与中国的贸易,在“欧洲人第一次认识这些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贸易成为大宗”,只是在1768年“本人按血统来说一半是中国人”的郑信登位以后。^⑩

第三,王室垄断贸易的废止及包税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进入 19 世纪 20 年代, 随着泰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贵族、高级官僚、港口官吏、中国商人和海员以及那些一切有办法参与其中的人都纷纷加入到贸易的行列。到拉玛二世末期, 王室垄断贸易几乎已无利可图。^①拉玛三世只好宣布放弃王室垄断贸易, 允许商人自由从事国内外贸易活动。华人在贸易中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大量来自中国的普通消费品如粗陶制品、茶叶、瓷器、水银、挂面、干果、布料、扇子、雨伞、书写纸、香、玩具等在进入泰国民间市场的过程中, “不得不依靠那些具有流动性、关系网、耐心和零售渠道的中国人, 以便把商品送到那些哪怕处于最偏远省份的消费者手中。”^②

为了弥补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损失, 满足政府对货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拉玛三世对国家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首先, 将征收实物税改为征收现款; 第二, 明显扩大了包税制的使用, 新增加了 38 种税项。^③许多华人以投标方式成功地取得了包税商的职位, 有的华人甚至承包 90 多种税, 并获得王室的封爵。^④包税制的实施, 使国家获得了稳定的巨额收入来源, 加强了中央对边远省区的控制和经济联系, 同时也为以华人为主的包税人提供了丰厚的收入。^⑤

2 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及其特点

到 19 世纪上半期, 华人继续保持航运业方面的传统优势, 在种植业、采矿业上又有了新的开拓。经过中国移民的努力, 甘蔗成为 19 世纪泰国最主要的出口作物之一, 主要矿区普吉岛人口由 1824 年的 5000 人增加到 1850 年的 40000 人, 拉廊居民点由一个不大的村庄变成一个有锡矿冶炼工场、码头、仓库的人口众多的采矿中心。^⑥尤其在商业领域, 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估计,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超过了华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 就泰国各种职业人数而言, 经营商业最多的是中国人。^⑦全国的商业中心曼谷是华人最集中的城市。1820 年左右, 所有来到此城访问的人都说, 实际上全部经商的人, 从曼谷许多河道上的浮动摊贩到富有的批发商栈主人, 都是华人。^⑧随着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 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日用消费品进入泰国, 华人开始在国内贸易中发挥比较显著的作用。他们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运到那些通过水路可以到达, 甚至更僻远些的内陆乡村, 换取货币或当地特产。^⑨到 1850 年时, 华人似乎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泰国的区间贸易。^⑩

在这一时期, 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多, 他们开始在共同地域和方言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形成所谓的“语系集团”, 即俗称的“帮”或“乡帮”。各帮最初以庙宇为中心组织起来, 如潮属人的“本头公庙”、客属人的“汉王爷庙”、广属人的“关帝圣君庙”、海南属人的“水尾圣娘庙”等。^⑪各神庙组织的核心又往往是由中国南方传入泰国的“天地会”分支“洪门”秘密会社。各秘密会社以语系集团的界限来收纳成员, “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这个或那个秘密会社”。^⑫虽然这些秘密会社有诸多负面影响,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它满足了会员在异乡定居、谋职、互助、抚恤死难华侨等要求, 起到了积极作用,^⑬并形成了华侨以乡帮为界限的行业分工。大体来说, 在这一时期, 商业、进出口贸易主要由潮州人经营, 其次是福建人。他们还是主要的包税人。从 19 世纪初开始, 大量潮州人定居于泰国的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 从事胡椒、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与些同时, 福建人大批前往马来半岛从事锡矿开采。广东人主要从事锯木业、经营机器店、铜铁店、丝绸店、旅馆和餐厅, 并充当工程师和技师, 并在建筑业中占居优势。客家人大都是小商人、小技工、体力劳动者、小贩和理发匠。海南人从事手工锯木、蔬菜种植、捕鱼、茶馆及充当仆役、小贩和矿工。^⑭华人经济活动在语系集团内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作是华人经济网络的早期形态。

总之, 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华人经济领域有所拓展, 经济实力有所提升, 一些华人

大商人兼包税人和华人矿主，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华人经济出现了在语系集团内部的纵向网络联系，但横向联系尚十分薄弱，成为这一时期华人经济网络的特点，也说明华人经济仍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

(三) 形成期：1851年至 1910年代

1 《鲍林条约》及其对华人社会的影响

1851年继位的蒙固王迫于西方殖民列强的压力，于 1855年与英国签订了《鲍林条约》。该条约规定开放泰国市场，只征收英国商品 3% 的进口税；允许英国人买卖或租用首都附近的土地，并给予英国人以治外法权。此后几年中，泰国又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类似条约。^⑤ 1873年，朱拉隆功加冕后，大力推行使泰国适应现代化的改革，废除奴隶制和强迫徭役制，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改革政治、财政和教育制度等。^⑥ 泰国由此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变成了一个廉价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及工业品消费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货币经济所取代。这一切都对泰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华人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鲍林条约》以后，“国王蒙固所支持的同欧洲商业有关的方针，产生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结束了华人对暹罗外贸的支配地位。”^⑦“过去由国王和包收租税人所垄断的进口商业变成了共有的，而最后被英国和其他欧洲商人所控制。”^⑧在欧洲人经营的汽轮的竞争下，华人帆船贸易急剧衰落了，原有的 400多只商船队变成了不及 100只船的船队。^⑨在森林开发、锡矿开采和经济作物种植（橡胶业除外）等需要足够资金取得租地特权和新型设备的领域，华人也逐渐失去优势。^⑩

另一方面，泰国经济的新变化为华人社会的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泰国蓬勃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如运河开凿、公路和铁路建设、港口建设和外贸的发展、现代化工厂的建立和运营、城市劳务、商业的扩展等，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在泰国经济机会的吸引下，华人移民有了空前的增长。从 1850年到 20世纪 10年代，华人入境人数从最初每年 1万多人增至最多达到近 10万人，而离境比率则相对较低（见图 2）。华人人口从 1850年的 30万人猛增到 1917年的 90多万人，增加了 2倍，而同期泰国总人口只增加了 0.78倍（见表 1）。大量涌入的华人移民为泰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大军，实际上，泰国

表 1 1850-1917年泰国中国人口增长示范表

（单位：千人）

年别	中国人总估计数	每十年增殖率%	暹罗人口总数	中国人占暹罗总人口的%
1850	300	11.6	5200	5.8
1860	337	12.3	5450	6.2
1870	383	13.6	5775	6.6
1880	435	13.6	6200	7.0
1890	497	14.3	6670	7.5
1900	608	22.3	7320	8.3
1910	792	30.3	8305	9.5
1917	906	20.6	9232	9.8

资料来源：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 1期，第 32页。

注：* 原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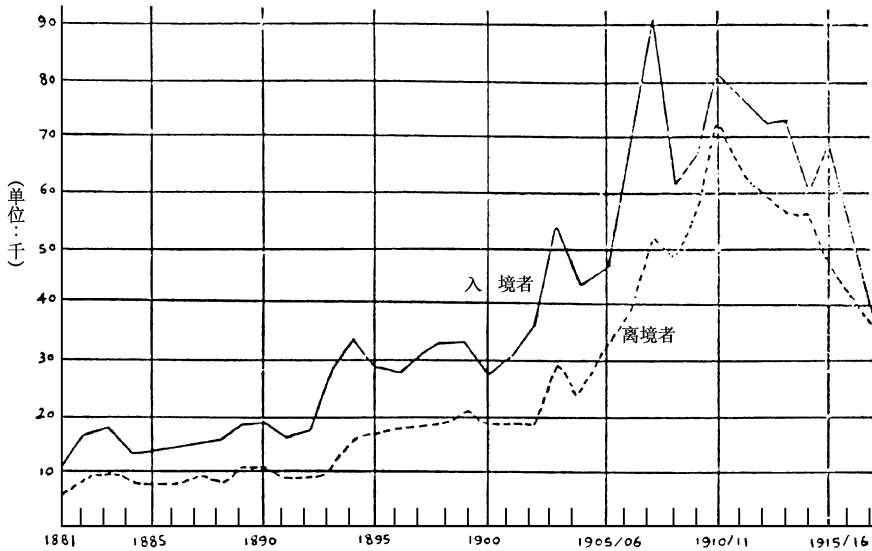


图 2 1882-1916年泰国每年入境和离境中国人变化曲线 (单位: 千人)

资料来源: 史金纳, 1964年第 1期, 第 22页。对于史金纳的统计, 泰国华裔学者江白潮先生表示赞同, 见江白潮:《二十世纪泰国华侨人口初探》, 盘谷银行总裁部华人事务中心编印, 1992年版。布塞尔亦持此观点, 见布塞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58年第 1期, 第 41页。

70%以上的非农业劳动力都是由华人承担的^{⑥1}“暹罗的发展吸引了华南的移民, 同时实际上暹罗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这些移民才成为可能。”^{⑥2}

随着 80年代末铁路建设的开展, 华人开始改变居住在港口和水路沿岸城镇的居住模式, 沿新兴的铁路网进入原来人烟稀少的北部、东北部地区。在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市镇, 华人都构成了当地人口的相当大的部分和主要的经商群体, 因而被旅行者描述成“无所不在的中国人”^{⑥3}。

其次, 随着华人社会的壮大, 华人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19世纪下半叶开始, 一批合法的语系社团陆续成立, 取代了原来的秘密会社。曼谷第一个语系集团形式的社团, 是广东人于 1877年建立的广肇会馆, 海南会馆大约在 1900的成立, 数年后福建会馆跟着成立, 客属会馆成立于 1909年。^{⑥4}人数最多的潮州人成立会馆最晚, 直到 1938年才正式成立^{⑥5}。20世纪初,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资本的竞争, 华商开始组成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跨越帮派界限的华人组织。1908年, 中华总商会成立。它以合法的商行为会员, 加强了华人在航运业、进出口业、碾米业和银行业的联合及整体实力, 成为泰国华人的重要组织。^{⑥6}中华总商会及各属华人会馆成为华人经济网络的组织基础。

2 大米出口与华人经济网络的形成

1855年后泰国经济最主要的变化是大米出口的急剧增长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的增加^{⑥7}。从 1850年到 20世纪 30年代, 泰国的大米种植面积从 580万莱增加到 2000多万莱, 增长了 3.4倍; 同期的大米年均出口量从 99万担增加到 2572万担, 增加了约 25倍 (如图 3所示)^{⑥8}。直到 20世纪 50年代, 大米始终是泰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约占全部出口量的 60-70%。^{⑥9}

大米出口业的发展, 成为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重要契机。大米出口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 使泰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功能, 即到农村收购大米, 运到港口出售给加工商或出口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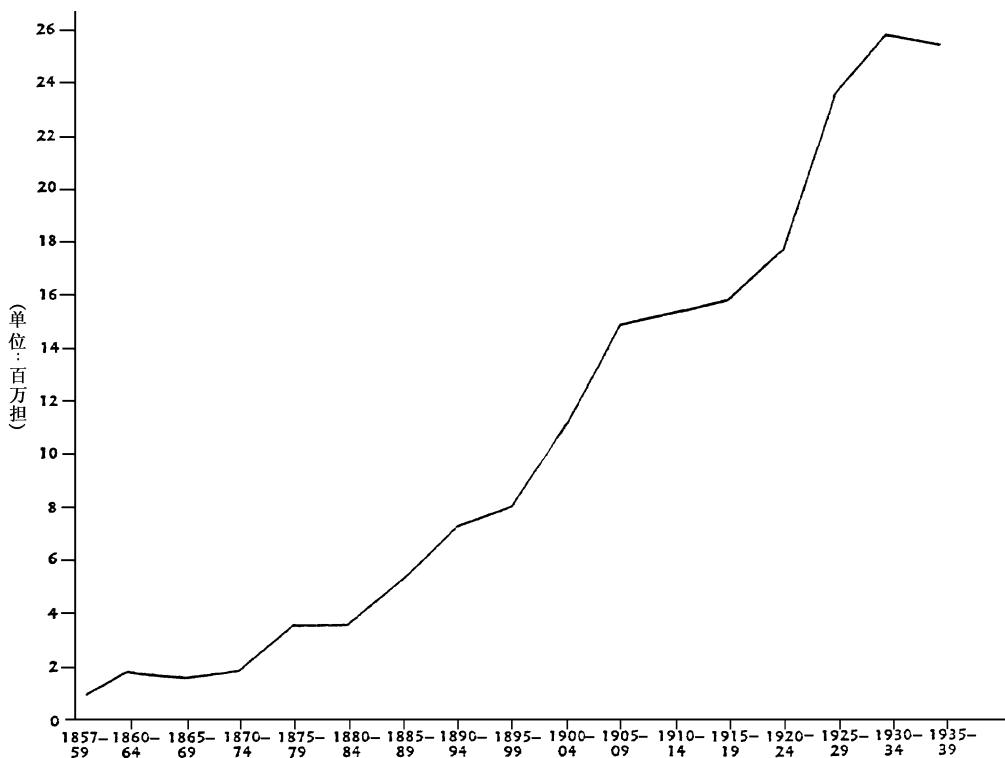


图 3 1857-1939年 (以五年为间隔计算) 泰国大米出口量

资料来源: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8, 39.

采购消费品,然后分销到农民手中。^⑩这种中间人的工作需要从事繁重的劳动,警觉和具有机敏的商业头脑,因此完全落入华人手中。^⑪中间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人”^⑫,他们不但买卖谷子,还向农民贷款、预付食品和衣物,拥有和出租土地,销售进口工业品,并经办两方面的运输工作。各种职能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于难以对某项单独职能的价值作出估计。^⑬华人的多重身份^⑭使他们既与大城市尤其首都曼谷的华人碾米厂主和批发商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同时往来于中小城镇,为那里的华人商店提供货源,并深入穷乡僻壤。中间人群体的活动不但增进了华人商业、航运业、加工业及进出口业的内在联系,而且将华人经济的影响力扩展到几乎每一块有人烟的土地上。

在大米业的刺激下,碾米业迅速发展成泰国最重要的工业之一。曼谷的华人大碾米厂经营着泰国大部分大米出口业务。华人碾米厂主将大米出口到香港、新加坡,然后再转口到马来亚、中国及周边亚洲国家。华人碾米厂主多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华商中寻找业务代理人,或亲自创办贸易和航运公司,直接从事以大米为主的进出口业务(见图4)。如潮州华人高楚香在曼谷拥有5家较大的碾米厂,他通过自己设在香港南北行街(文咸西街)的贸易公司元发行,将大米运往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再把中国的南北土产进口到泰国。^⑮潮州华人陈慈贇于1871年在曼谷创办陈贇利行,经营进出口业务和碾米业。20世纪初,他在香港和汕头设立贇利栈,并创办贇利船务公司,航行于汕头、香港、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及缅甸各港口之间。^⑯伴随着泰国华人经营的大米出口业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南海连接东南

亚的海域周围,一个以香港为中心,以新加坡、泰国曼谷和中国汕头为支点的贸易网逐步形成,即“香(香港)-叻(新加坡)-暹(泰国曼谷)-汕(中国汕头)”贸易体系^①该体系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达到顶盛时期

20世纪初,随着华人企业资本周转和外汇需求加大,华人金融业出现了。最早成立的华侨银行是尧盛钱庄(1904)、源利发银行(1905)和华暹银行(1908)^②不久曼谷就出现大约有20家大小银行和银庄,从事以华人为对象的借贷业务。经营汇款业务的华人信局、银号等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③

总之,伴随着泰国现代化的进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华人的商业活动逐渐从制造业和商业部门扩展到农业和矿业部门,并最终扩展到经济的所有领域”^④,华人经济网络获得空前发展。在广度上,它突破语系集团的局限,出现了横向网络,横跨商业、进出口业、航运业、碾米业和金融业,使各行业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

在深度上,它使泰国最基本的产业——米业与世界市场相接轨,为泰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有效的媒介。19世纪末各语系社团的成立及20世纪初中华总商会和各种行业性组织的建立,使华人经济网络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松散走向机制化,大大提升了华人经济网络的层次。20世纪前后,该经济网络突破泰国一国的界限,通过新加坡、香港,扩展到东南亚周边国家和中国南方地区,形成了著名的“暹-叻-香-汕”体系。以此为标志,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初期基本上形成了。

20世纪10年代末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国辛亥革命及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世界性经济危机、泰国1932年革命及其限制华人移民和经济活动的法令问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暂时中止了华人经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里,华人经济网络经受住考验并巩固下来,终于在战后进入大发展时期,并在东亚经济崛起的历史时刻焕发出新的生机。对该段华人经济网络的考察,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 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诸因素分析

华人经济网络虽然在战后才引起世人的瞩目,但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东南亚的古代社会,其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古代东方世界,中国长期处于该地区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并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东亚“华夷秩序”体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都处于该文明圈范围之内^⑤因此,当中国移民开始“流寓”东南亚时,他们是作为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具有某种天然的经济优势。而且,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南宋以来,那里的航海贸易、手工业和矿业都十分繁荣,使华人有机会掌握比较丰富的商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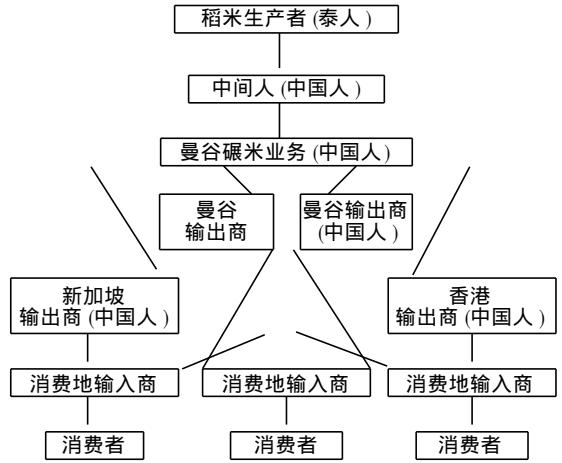


图4 华人在大米流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松尾弘:《暹罗国民经济的特征》,第144页。转引自杨建成主编:《泰国农民与华侨》,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台北,1986年版,第32页。

知识和技能相反,东南亚各国生产力水平却相对落后,“商业运作和市场交换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给华人提供了很多机会”^⑧可以说,中国和东南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差距,为华人在经济领域建立优势,提供了历史前提。另一方面,移民者的身份和侨居心理,也是华人从事商业的重要原因。华人大多是由于家乡贫困或战乱而被迫出洋谋生的贫苦大众,只随身带少量衣物飘洋过海,不拥有土地、矿山等生产资料,只能聚居在港口和市镇出卖体力、经营与中国商品有关的小买卖,或凭在家乡学成的手艺做工匠。“因此自我就业经营小买卖几乎没有土地的工资劳工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⑨同时,华人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他们与祖国保持密切关系并准备最终回到家乡。“华人移民来到东南亚是为赚钱而非定居,他们在国内的成功与地位是由他们寄回家乡钱数多少来衡量的。”^⑩因此,他们更喜欢从事有快速回报和资金流动性强的行业,商业自然成为华人的最佳选择。由于以上原因,作为农业民族的华人,移民到东南亚之后普遍“华裔化”了。故而,王赓武教授认为,华裔形态是中国移民的最基本的、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也是1850年前仅有的重要形态。它是宋朝以来中国国内商业、手工业和矿业实践的引申。^⑪

泰国直到阿瑜陀耶王朝初期(相当于我国明朝初期)才过渡到封建制社会^⑫,生产力水平落后,而且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戴莱洛迦纳王(Borama Tralokanat, 1448-1488)颁行萨克迪纳制度,又称授田等级制或食田制。国王作为全国土地的主人,按照贵族、官吏的爵位、职务和官衔的不同,授予不同面积的田地,庶民和农奴亦可分得少量土地。贵族和官吏依靠所授田地及田地上“自由民”的供奉生活。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自由民”人身连同所得土地,都必须归依某一个封建领主。在保护人的严密控制下,自由民不准离开领主属下范围,并对国家负担着极其苛重的徭役。年龄从18岁到60岁的男子,每年都要服役6个月,特殊情况下还要被征调修路、挖运河,不受时间限制^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泰国平民既没有从事商业的可能,也不具备商业资本和经验。相反,中国移民被特许免除徭役,也不必依附于某个保护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泰国境内自由旅行和定居。因此,华人移民充当了泰国商人、国王海外贸易代理人及捐税承包人的角色。正如兰登所说的:“大致而言,泰国社会是分层的。泰国农民负责农业生产和统治者管理国家,在他们两者之间并为这两者服务的,是广阔的华人阶层。他们分布于商业、贸易和工业的所有领域。”^⑭

萨克迪纳制度废除以后,泰人获得了迁徙和择业的自由。然而,大多数泰人固守农业生产,而把其他大多数工作让于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经营。这一方面是世界市场对稻米的大量需求造成米价上涨,种稻米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农业对泰人而言,古老而荣誉,胜于其他一切行业。这种行业喜好差异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能是泰国经济特色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喜好的区别,难以用经济学思维来解释。”^⑮因此,“拉玛四世及拉玛五世统治时期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是使泰国庶民更加偏爱从事稻米生产及粮食农业,和加强了华侨在商业、工业、矿业和工资劳工等方面的掌握。”^⑯

泰国王室对华人的优待政策也是影响华人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泰国长期人口稀少,且缺乏商业、航海人才,而中国移民正好弥补了其劳动力的不足,活跃了泰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因而受到泰国统治者的欢迎。从阿瑜陀耶王朝时起,泰王室就采取了吸引华人移民的政策,“国人礼华甚挚,倍于他夷。”^⑰首都大城有较大规模的华人居住区,华人的水上商店经营着瓷器、铜器、银器、碗碟及各色丝绸、铁器和各种工具、食品及水果等,应有尽有,十分繁荣。巴塞铜王、帕那莱王时期开始实行王室垄断贸易,任用华人负责征集出口物资,建

造商船、担当水手和代理商等，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20 年代垄断贸易的废除。许多华人因为从事对华贸易有功，被封官赐爵。如台萨王时代商船贸易巨富王兴川的儿子之一座山施，获赐坤通史男爵，负责带货及贡品到中国贸易，后又晋升为銮西松巴子爵，并赐封为港务官。^⑭ 1688 年，帕那莱王去逝，象队统帅珀碧罗为首的亲王、大臣发动政变，赶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侵略者。正如史金纳所指出的，“1688 年革命的结果是欧洲人在暹罗对东亚各国的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落入了中国人手中，因为中国人丝毫没有受到帕那莱王的继承者们所排斥”^⑮

吞武里和却克里王朝继承了前朝的优待和重用华人的政策，在郑信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尽快恢复经济，郑信“依靠来自广东东北部其潮州故乡的潮州华人帮助自己巩固在暹罗南部和东南部的政权，加强王室贸易和商品垄断，这对鼓励华人渗入泰国经济生活来说，不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⑯在郑信统治后最先访问泰国的欧洲人之一的克劳福德写道：“达信的同乡们是在他鼓励下才这么大批地被吸引到暹罗来定居的。华侨人口的这一异常扩张，几乎可以说是该王国数百年中所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⑰

却克里王朝的统治者在信任和重用华人的同时，还把一些华人精英分子吸纳到泰国统治阶层当中。如福建华侨许泗章于拉玛三世时期到董里府开采锡矿业获得成功，前后三代锐意经营，推动了泰南经济的发展。1862 年，许泗章被封拍耶爵衔，升任拉农府府尹。他的儿孙中有九人被封为拍耶爵衔，五人被封为銮爵衔，三人被封为坤爵衔，多人担任府尹等要职。拉玛六世特赐姓“纳·拉农”给许氏家族，以表彰其功绩。^⑱朱拉隆功王在 20 世纪初所发表的一个关于华人的公告，反映了泰王室华人政策的核心：

我的政策一向是使在暹罗的华侨和我自己的国民享有相同的劳动和获利机会。

我不把他们看做外国人，而把他们看作这个王国的组成部分之一，分享它的繁荣和进步。^⑲

泰国作为东南亚历史上唯一保持独立地位的主权国家，能够确保其华人政策的连续性，也避免了类似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由于西方殖民者挑拨而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华人的流血事件，因而华人在泰国能够在平等祥和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顺利建立起各种经济事业。这为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和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对于华人经济网络的任何解释，抛开文化因素都是不全面的。华人移民身份和文化背景对华人经济活动的方式具有直接的、深层次的影响，是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陌生的国度里，作为侨居者和少数民族，华人往往寻找“同类”获得认同和相互支持。他们受雇于亲戚、同族或邻居，一开始只能与来自同一方言集团的成员交流。因此，“某一方言集团垄断特定职业和经济领域的现象反映了人们愿意和讲同种语言的那些人共同工作的天然和历史的倾向。”^⑳陈达通过对 905 个华南华侨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与南洋的联系”在出国原因中仅次于经济压力而列第二位，其中包括已有祖父或父亲在海外有自己的生意，以及没有家族生意但在南洋已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或同乡，从事各种业务。只有极少数人仅仅出于南洋的吸引而移民，而没有任何联系。^㉑这进一步证实了华人经济的血缘和地缘色彩。

随着华人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扩大，建立一种协调市场上各方面的关系的经济运作方式成为必要。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伦理提供了该种经济运作方式的理论框架。古典儒学认为，自我是所有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要成为一个完人，自我必须在人类关系的结构范围内不断地与他人对话——始于与家庭成员的联系，扩展到家庭结构之外，进而

超越种族和文化中心主义,最后超越人类本位主义。^①这种思想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②,就象“一块石子投入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③。在中国本土,父系亲属关系的亲疏构成了差序格局中的社会网络,由于华南地区许多村庄都是同姓村,血缘和地缘关系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华人移民海外后,他们本能地从社会传统中寻找建立彼此社会和商业关系的根据。在海外,父系亲属关系虽仍保留,但难以组成父系亲族团体,所以亲人关系大为扩大,转而以共同姓氏作为辨认亲族关系的标准。^④这样,海外华人以家族、宗亲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商业网络,同时扩展到亲属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同乡、朋友、邻居及其他有过关系的人,甚至熟识的非华人成员。这种网络为华人提供了在雇佣、信贷、信息、市场销路和合同安全系数方面的竞争优势。例如,华人获得贷款的利息往往只有越南商人的一半,从而能够垄断资金周转长、利润率低的批发业务,而越南人只好放弃。^⑤

兰登博士在本世纪40年代对一位泰国华人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了中国本土以家族和宗亲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在海外的生命力。调查显示,宗族仍是泰国华人社会的亲戚关系的单位,并保持着活力。宗族的族长、大家庭以及核心家庭的家长负责决定该族人员的诸如职业选择、交易、教育等问题。年轻人的职业由家族圈内议定,以维系家族经济的发展。^⑥

华人与泰人在其他文化特征方面的许多差异,加强了华人经济网络这一现象的形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理财”观念的差异。华侨注意节俭并擅于理财。其原因是,第一,华侨来自人稠地狭的华南地区,艰辛的生活养成了他们节俭的习惯,加之由儒学伦理中形成的家族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华人能够放弃自我享乐而想尽一切办法勤俭致富;第二,中国有比较发达的货币经济和商业活动。在传统中国社会就存在“会”这种民间信贷组织^⑦,从中国移出的大多数华人也把这种信贷制度带了出来,在银行业不发达的东南亚社会,成为华人筹集商业资金的有效手段。此外,华人常常把闲置的资金用于投资或放贷以增值,而借债者也乐于借钱作为商业资本,这种借贷关系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并为日后进一步合作提供方便。“大量的中国人处于长期借贷状态,这似乎是中国人生活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状态。”^⑧相反,泰国有强烈的“散财”传统。其原因是,第一,泰国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生存必需品易得,加之家族观念淡薄,使泰人向来没有积蓄的习惯;第二,历史上形成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制度^⑨使“散财”成为一种赢得劳力进而赢得社会地位的手段;第三,佛教强调个人修行与解脱,为利而借钱给别人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而从别人处借钱则包含一种耻辱和失败感。^⑩这种“理财观念”的文化差异,强化了华人在泰国经济生活尤其是信贷方面的优势地位。

在华人经济网络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时代机遇起到了不可忽视甚至相当关键的作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后形成,东南亚地区被完全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沦为西方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更加大了对东南亚的投资,以开发矿业和从事经济作物种植,设立银行和扩大国际贸易。这种时代条件的改变提供了华人经济网络壮大和最后形成的契机。首先,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开发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华人社会空前壮大,而且“大批中国移民来到东南亚,正是殖民主义和市场力量将东南亚的初级产品推向世界市场,从而导致商业生产扩展,孕育新的经济机会,尤其在中间商业领域的时候。”^⑪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于1819年和1842年先后被英国人开发为贸易基地,从而“不仅为华人提供了向东南亚移民的新基地,而且也使香港成为东南亚

与香港及东南亚与中国贸易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至今未变。”^④正是在这一时期,泰国华人经济网络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形成了暹-叻-香-汕贸易体系。其次,殖民投资为华人经济网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资金和物品。因为西方人发现,与其组织一个新网,不如充分利用原有的华人网络来收集出口原料和分销进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的商行和银行雇用中国人作买办,通过华人经济网络,处理当地商务。因此,尽管归根结底华人经济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但西方资本在进入东南亚市场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借助华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商业渠道和拥有的信息优势。于是,“西方人反而变成依赖自己的主要竞争者了。西方商行在零售业或内地商业方面不发生任何重要作用。”^⑤

在华人经济网络和其形成要素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简单化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体。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伦理的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其中没有直接、明显的相互关系。这种解释模式同样适用于华人经济网络。戈斯林(L. A. Peter Gosling)教授指出:“华人统治商业并非由于有什么天生的独特之处,他们只不过是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出现的适当的人物。”^⑥这句话虽然过于简单和有失周密,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华人经济地位及其成因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 华人经济网络的结构与主要特征

东南亚华人在长期的海外谋生的过程中,在各种条件的凑合下,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色彩的经济网络。通过这些网络,华人企业保持了持久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对华人经济网络的内在机制——结构及其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华人经济网络的结构

中国儒家伦理所规范的社会“差序格局”是华人经济网络的文化根源,也是我们分析华人经济网络结构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就个人而言,其社会关系网络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个同心圆所构成;在社会的意义上,华人经济网络是以家族企业为结点,以社会关系为经络,以社会关系的亲疏等级为半径编织的同心圆。无数个这样的同心圆相互交织、渗透,构成了华人经济网络的整体结构,如表2和图5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家族企业是构建华人经济网络的核心,也是华人经济最基本的单位。家长式管理、重用亲戚和所有权归家族所有,是华人家族企业三个最主要的特征。^⑦公司被视作家族财产,其主要作用是增加家族的财富和声望,因此,管理权和决策权严格掌握在家长(企业创办人或其继承人)手中,使企业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企业最高层的核心职位多由家庭成员或与企业所有者关系密切的朋友担任,局外人很难进入管理层。^⑧父子亲属关系原则在公司管理和所有权拥有上具有重要意义。公司管理权一般传给男性继承人,财产由每个男性后代均分。由于这些特点,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一般经历形成、集中、分化和解体的演变过程。在第一个阶段,财产、管理权和利润都集中在家族内部;在第二个阶段,财产和管理权仍集中,但利润开始分解;在第三个阶段,只有财产仍归家族所有,管理权已分属不同继承人,终于导致该家族企业最后解体,同时意味着新的更多的家族企业的诞生。^⑨

由于对血缘关系和个人信用的依赖,华人企业规模都不大。但是,它们都镶嵌在强有力的经济网络上。^⑩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单一的华人家族企业通过4种关系原则,与其他企业建立程度不同的联系。这些原则是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地域关系和种族关系。华人根据

这些原则,确认其潜在合作伙伴的身份及其等级,以放入合适的位置,建立相应的合作关系。^⑩华人首先从靠近自己的内圈中寻找生意伙伴,由最亲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员或同乡组成小型商业网。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他们的选择半径也愈大,成员愈加复杂,可能超越语系集团和地缘的界限。最后,当潜在的经济利益大于与其他种族合作的代价时,华人甚至跨越种族的外在界限,建立与“圈外人”的联合。因此,华人企业虽然缺乏庞大而复杂的内部组织,但仍旧充满活力。根本原因在于,网络的联系机制使它们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正如高伟定(S. Gordon Redding)教授所指出的,华人经济是“拙于组织而长于联系”。^⑪

表 2 华人社会关系类别

	社会关系类别	等级
A 圈内人	1 核心家庭成员	1
	2 来自扩展式家庭的远亲	2
	3 宗族成员	3
	4 同乡	4
	5 同一语系集团成员	5
	6 其他语系集团成员	6
B 圈外人	7 非华人	7

资料来源: Janet T. La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thnically Homogeneous Chinese Middleman Group in Southeast Asia: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 Plural Society*, in Linda Y. C. Lim & L. 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 1, Singapore, 1983, pp. 9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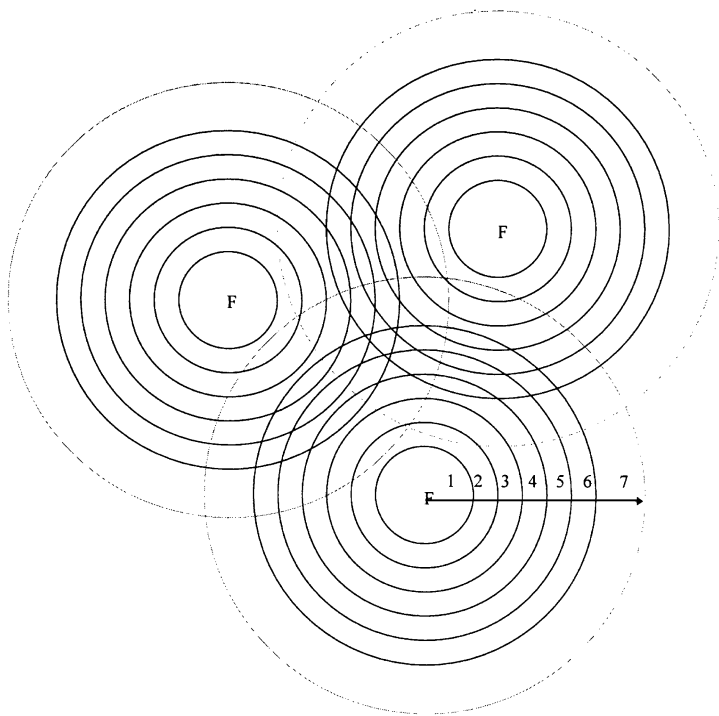


图 5 华人经济网络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 本图参阅以下文章制成: Janet T. La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thnically Homogeneous Chinese Middleman Group in Southeast Asia: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 Plural Society*, in Linda Y. C. Lim & L. 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 1, Singapore, 1983, pp. 96-97;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Watter de Gruyter & Co., 1990, pp. 53-58.

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尚未最后形成,华人家族企业运作主要在同宗同

乡的范围之内,没能建立更广泛的外部联系。19世纪下半叶,泰国华人经济活动从行业内发展到跨行业,从国内发展到跨国联系,编织了庞大的网络,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泰国黄利家族企业的发展比较充分地印证了华人家族企业在网络构造上的意义。

黄利家族企业创立于1871年,其创始人是广东澄海县人陈慈羹。他的父亲陈焕荣(字宣衣)早年经营中泰之间的帆船贸易,往来于汕头、上海、天津、青岛、曼谷、香港、新加坡等港口,把泰国大米运到国内,把中国各地特产运到海外贩卖,人称“船主佛”。1851年,在香港文咸西街创办乾泰隆商行,从事以香港为中心的转口贸易。^⑤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契约劳工来到东南亚,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人员、汇款往来和特产的交流。乾泰隆抓住时机,在各地广设联号,建立商业网。19世纪末,乾泰隆分别在曼谷设黄利,在新加坡设陈生利(后改组为陈元利),在汕头设陈万利及乾利和在越南西贡设立乾元利各行。^⑥其中,黄利行由长子慈羹掌管,经营大米贸易,不久开设蒸汽碾米厂;陈生利行原由陈氏族人共同持股成立,19世纪末改组后更名陈元利行,由长子陈慈羹经营,主要业务是将泰国黄利碾米厂出产的大米运销到新加坡、马来亚、文莱、印尼等地;^⑦西贡的乾元利行由长子长孙陈映辉主持;汕头业务由陈焕荣兄弟的孙子由扬负责。^⑧这样,到19世纪末,陈氏家族以乾泰隆家族企业为核心,通过父系亲属关系,建立起庞大的经济网络。

黄利公司继续发展自己的商业网。陈黄利在香港设立经营大米的分行,在汕头设立黄利栈,经营出入口业的钱庄。^⑨1891年陈黄利次子陈立梅接掌公司领导权后,设立中暹轮船公司,经营挪威BK船务公司在亚洲的代理业务,拥有10余艘轮船航行于泰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越南、中国华南、华北各港口之间。在泰国开设5家蒸汽碾米厂、2家出口商行、1家进口商行、1家机器行。他还在曼谷、香港、汕头、新加坡、西贡、槟榔屿等地设立黄利栈汇兑庄,以供各港口联号调用资金。^⑩这样,到20世纪初期,以泰国陈黄利家族企业为核心,又衍生出新的网络。

(二) 华人经济网络的主要特征

通过考察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其结构的分析,我认为华人经济网络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自发性。作为“天朝弃民”,华人在海外谋生不可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作为寄居者,他们也难以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只能在所在国经济的壁龛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在亲友、乡邻之间建立各种联系,相互扶持,团结自救。泰国华人最初以供奉本乡祭神的庙宇为中心组织起来,进而建立以共同方言为基础的群体,即所谓的帮。各帮内部由于地缘、血缘的纽带联系,在雇佣、资金、信贷、销路等方面提供方便,进而形成了在某几种行业中占据优势的局面。不同的帮别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工。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打破各帮之间界限,建立了全社会范围的商业组织和各种行业公会,华人经济网络逐渐形成。

第二,互利性。华人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企业,资金、人员、信息都十分有限,独立发展将面临很多困难。东南亚地区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信贷、资讯、劳力等设施 and 条件不健全;在许多国家,华人还面临着西方殖民者的盘剥和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华人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很高。因此,华人企业运用网络的运作方式,降低它们之间的市场交易的成本。首先,网络中成员之间能够保持一种信任和友善的关系,能够克服一般市场交易的弊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安全系数。其次,在信贷、销路和信息方面,网络

成员间往往能够资源互享。如泰国华人零售商能够以代销方式从华人批发商那里得到商品,在一定期限内(一般是逐月或逐周)偿还贷款,直到全部商品卖完,贷款付清。这种作法一方面可以使零售商能够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做生意,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批发商的业务,对交易双方都十分有利。通过这种金字塔式的制度,能够使一个小店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起来。^④

第三,灵活性。信用是维系华人经济网络运行的关键因素。黄绍伦先生认为,与西方企业讲求“制度信用”不同,华人更注重“个人信用”。^⑤华人的生意多在同族、同乡、朋友等之间进行。当交易双方缺乏上述联系和共性时,往往需要中介人从中引见,帮助建立一种个人化的关系。做生意时,强调面对面接触和口头合同,一般不采用正式合同或专业代理机构。对华商而言,个人关系先于组织,他们倾向于培育变动、多股的经济关系,避免永久的、一对一关系的形成。^⑥由于具有这种特性,华人经济网络便于企业决策果断和保守秘密,使家族企业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尤其在那些具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如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变动的工业部门或者新兴的经济领域中,华人经济网络使华人企业能够很快适应下来并发展壮大。如前文所述,龔利家族企业在20世纪初迅速适应形势,从碾米业扩展到航运、信贷、进出口等业务,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人大企业。

第四,开放性。华人经济网络虽然强调血缘、地缘、方言等关系,经济活动以家族企业为单位,交易多在本族范围内进行。然而,华人经济网络并不是封闭和排外的,相反,是开放和变动的。家族经济所有权、财产权或控制权是明确的,然而其外在界限是模糊的,取决于该企业经济实力、经营范围和它的社会关系的状况。例如,一个小公司的所有成员可能都来自同一家族:祖父母、父母和孩子;当该公司生意扩大后,一些远房亲属以及毫无关系的人,也会加入进来。^⑦龔利集团就曾任用非本家族的成员担任一些重要管理职位。如旅泰华人陈岳武被委任为龔利有限公司财政经理,一直工作到老年。^⑧实际上,成功的商人并不是被固定于传统的华人社会关系或组织当中,他们不断地选择、调整和丢弃其网络中的某类联系。一般来说,华人在创业初期寻求亲族作为商业伙伴;成功后,他们将越来越多的非亲族,及至其他种族的“圈外人”吸收进来。^⑨

第五,从属性。华人经济网络虽然富有活力,但是,华人经济以商业资本占主体,工业资本相对薄弱,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网络相比,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层次。在20世纪30年代,泰国华人在第三产业的投资仍占全部资本的91.7%。^⑩商业资本的性质使华人经济具有鲜明的流动性,缺乏长期投资。^⑪而且,在殖民时代,华人经济网络介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东南亚原住民农业经济之间,充当西方资本的买办和附庸,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⑫这些弱点妨碍了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

(三) 华人经济网络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泰国华人通过网络建立各种经济联系,不仅有利于华人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泰国社会经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尤其在19世纪中叶泰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促进泰国农村货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泰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

早在17世纪中叶,华人已经成为泰国国内商业以及国外贸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⑬长期以来,华人担任泰国的大小商人、王室海外贸易的代理商、管理员、船长、水手等,以及各种税务官和包税商人。通过这些活动,在泰国构建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从而有效地弥补

了泰国商品经济的空白,推动了泰国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后,华人中间商在泰国广大内地的活动,将泰国农民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农民生产的粮食不再仅仅用来作口粮,而是卖给华人中间商,换取货币;日用消费品也不再自己生产,而是向华人零销商购买。华人通过遍布国内外的贸易网,将泰国大米、锡等产品输往海外,供应世界市场,同时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品输入泰国,从而加快了泰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为现代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第二,为泰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泰国现代工业企业开始兴起,但由于资金匮乏和缺少管理人才以及技术工人,发展受到很大限制。^⑬华人利用经济网络、信贷、销路渠道和劳力来源的优势,很快成为泰国近代工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骨干力量。

从50年代末开始,碾米业开始成为泰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华人很快占据了优势。1858年,第一家蒸汽碾米厂出现在曼谷,由一家美国公司经营。^⑭华人碾米厂很快后来居上,到1879年,曼谷华人碾米厂数量已和欧美工厂不相上下。到1889年,华人碾米厂已有17家,1895年有23家,到了1912年,已达50多家。在此期间,欧美工厂或是转卖给华人,或是遭受火灾,到1912年,只剩下3家工厂了。^⑮由于大米出口在泰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华人碾米厂的发展,对整个泰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带动作用。

在其他众多工业部门,如制革、玻璃器皿、印刷、砖瓦制造、制盐、机器行、家具、医药、食品加工、制陶、香水和化妆品等,华人资本和人员也占主体。1926年泰国取得关税自主权后,提高了西方工业品进口税,从而刺激了一大批企业兴起,包括肥皂业、糖业、烟草业、棉纺织业、造酒等,其中华人资本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相比之下,“作为私营企业家,泰人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⑯

华人对泰国经济的贡献受到泰国王室的称道。1913年,拉玛六世在对内阁的讲话中指出:

本王国的经济繁荣完全依靠来自华人的资金,以及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移民将是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⑰

四 结论:作为一种现代化方式的华人经济网络

本文以东亚现代化为着眼点,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孕育、发展和最后形成及其成因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研究表明,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演变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形成,是泰国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背景、华人文化传统以及世界资本主义进程所带来的时代机遇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用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来单独解释华人经济网络都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在本质上,华人经济网络是华人移民在自我能量与生存环境之间作出的一种反应,是华人在移居东南亚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虽然华人经济网络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的色彩,但是,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的发展历程表明,华人经济网络不是种族文化的产物,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是所在国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华人加入了当地国籍,更从法律上明确了这一事实。因此,“正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他们所在国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样,东南亚华人间的网络联系也是东南亚各国间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不存在独立于东南亚各国经济之外的东南亚华人经

济。”^④所谓的涵盖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中华经济圈”或“华人经济圈”的提法，显然是无视历史和违背客观事实的。^⑤

最后，本文通过对泰国华人经济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泰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的分析，证明华人经济网络是一种与西方科层制和专业化的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组织，是东亚国家独特的现代化方式。华人经济网络源于东亚和华人社会传统，本身不具备任何属性。它既可以推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同样可以适应于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东亚的现代化不必刻意仿效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割裂传统，事实上，经济网络是更适合亚洲经济发展的“处方”。^⑥网络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对现有东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补充。在实践上，它为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另一种战略思路，即通过培养经济网络，不发达国家可以克服民族工业规模弱小的弱点，增强本国企业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⑦从而达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五 本文的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着眼点

本文通过对泰国华人社会的分析，试图说明东亚华人经济网络形成的脉络及其总体面貌。尽管泰国华人经济网络在东亚地区较具代表性，然而，单单一个案例分析显然不能提供证明本文结论的充分的经验性基础。下一步将选取东亚若干有代表性的华人社会，对其经济网络作比较性研究，相信有助于克服个案研究的局限。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中国古籍中关于泰国的记载、西方殖民官员的游记和访问记、中外学者的有关著述和中国侨乡的地方史料等。由于条件所限，泰国华人经济活动的更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如各类华人组织的档案、华人家族企业史料、族谱以及华人社会的实地调查等，仍相对缺乏。华人经济网络这一课题更加深入和丰富的研究，将有待于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本文在广义上使用东亚这一概念，涵盖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② 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关于东亚经济成功的解释，参阅任晓：《经济、文化、政治：东亚经济成功的三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春季卷（总第7卷），第57-65页；鲁思·麦克维伊：《东南亚企业家的崛起》，鲁思·麦克维伊主编：《东南亚华人大企业家》，中译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④ 关于华人经济网络研究的成果，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Watter de

Gruyter & Co., 1990; Gary Hamilton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Constance Lever-Trary, David IP,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Murray Weidenbaum & Samuel Hughes *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Martin Kessler Books, The Free Press, 1996; 游仲勋：《华侨——经济网络化的民族》，讲谈出版社，东京，1990年，等。

⑤ 1939年前泰国名暹罗，本文为叙述方便，一律称泰国；同理，20世纪中叶以前东南亚中国人属于华侨范畴，本文一律称华人。

- ⑥ 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第64-66页;丘立本:《东南亚华人网络——过去、现在与未来》,《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1期,第41页。
- ⑦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见韩振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页。
- ⑧ 《汉书·地理志》。
- ⑨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台湾,1976年版,第26页。
- ⑩ G. W. 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第105页。
- ⑪ Kenneth Perry Landon,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1, p. 4.
- ⑫ Saras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
- ⑬ 黄衷:《海语》暹罗条。
- ⑭ 许肇林、段立生:《阿瑜陀耶的外籍侨民》,《东南亚学刊》,总第10期,1993年,第2页。
- ⑮ 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第109页。
- ⑯ 张燮:《东西洋考》(卷三)。
- ⑰ 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第114页。
- ⑱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P. 46.
- ⑲ 段立生:《泰国史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 ⑳ 日本人曾在厄迦陀沙律王(1605-1610)和颂昙王(1610-1628)的宫廷中充当卫队,成为当时泰国政治中的重要势力。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西方殖民者接踵而至,通过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在泰国的许多经济权利,并干涉政治和外交大权。参阅 W. A. R. Wood, *A History of Siam*, Bangkok: The Siam Barnakich Press, 1933, p. 159;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8-117.
- ㉑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17.
- ㉒ V. 布塞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28页。
- ㉓ 史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第111页。
- ㉔㉕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p. 19 p. 27.
- ㉖ 《清史稿》卷五二八《暹罗传》中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谕礼部曰:“暹罗米甚丰足,若运米赴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十万石贸易,有裨地方,免其税。”雍正、乾隆两朝又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大米进口的措施,如给进口大米的外国商船免税,本国商民自备资本赴泰国造船买米,运回中国,并对运米2000石以上者赏给衔顶带,以示鼓励等。参阅俞云平:《十八世纪的中暹大米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第26-27页;余定邦:《中泰早期大米贸易与华侨的贡献》,载郑民、梁鸣初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210页。
- ㉗ 《克劳福德文件》,1915年,第120页。转引自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见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
- ㉘ J. F. 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
- ㉙ 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译本,中华书局,香港,1988年版,第222页。
- ㉚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第8页。
- ㉛ 郑信系中泰混血儿。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其父郑镛于清朝雍正初年赴泰,后与泰女洛央结婚。又称披耶达信,披耶是爵衔,这是他任达城总督时的官衔,信是名字。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作郑昭。详情参见 Luang Wiji Watkan 著、许云樵译:《暹罗王郑昭传》,中华书局,1955年版。
- ㉜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第2页。
- ㉝ 朱振明:《中泰关系史概述》,《泰中学刊》,泰中学会出版,1994年,第14页。
- ㉞㉟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第32页、第8页。
- ㊱ Hong Lysa, *Thai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4, p. 44.
- ㊲ 当使团从北京返回泰国时,吞武里王朝已被却克里王朝所取代,但郑信使团从中国运回的硫磺、硝

石、银、铜等战略物资和砖、瓦、石板等建筑材料，以及一批华人工匠，在首都曼谷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参阅段立生：《郑信与中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265页；朱振明：《中泰关系史概述》，《泰中学刊》，泰中学会出版，1994年，第13-14页。

38 Klaus Wenk, *The Restoration of Thailand under Rama I, 1782-1809*,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8. p. 35.

39 John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41, vol. 6, p. 199.

40 John Crawfo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09.

41 国家档案，第四期，甲拉宏，关于椰子油税收的法令。转引自 J. W. 库什曼：《暹罗的国家贸易与华人掮客，1767-1853》，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42 Hong Lysa, *Thai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47.

43 Damrong Rajanubhab, *Various Principles and Customs*, vol. 2, Bangkok, 1972. 转引自 Hong Lysa, p. 77.

44 John Bowring, *The Kingdom and People of Siam*, vol. 1,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West Strand, 1857, p. 87.

45 Hong Lysa, *Thai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90-98.

46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近代史纲》（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78页。

47 邓水正：《19世纪中期以前泰国华人经济概述》，《东南亚学刊》，总第5期，1988年，第102页。

48 乔治·劳利森：《出使暹罗和顺化记》，1826年，第106-108页。转引自卡迪：前引书，下册，第416页。

49 James C.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19.

50 Bowring, *The Kingdom and People of Siam*, vol. 1, pp. 85-86, 242.

51 林风：《论“五缘”关系与泰国社会华侨华人族群》，《华侨与华人》，1991年第1期，第51-55页。

52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续）》，《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第72页。

53 方雄普、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页。

54 史金纳：《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第70页；1964年第1期，第11-12页。

55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下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第762-763页。

56 同上，第765-771页。

57 卡迪：前引书，下册，第440页。

58 布塞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35页。

59 W. A. Graham, *Siam*, vol. 1, London: Alexander Moring Limited, the Dela More Press, 1924, p. 209.

60 T. H. Silcock (ed.), *Thailand: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in Development*,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4.

61 Landon,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p. 128.

62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续）》，《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第3页。

63 Campbell, *Si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02, p. 219; 在1919年-1929年泰国国情调查中，有关于华侨人口分布的统计数字，见杨建成主编：《泰国的华侨》，中华科学院南洋研究所，台北，1968年版，第25-26页。

64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续）》，《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第88页。

65 市川信爱：《泰国华侨社会的特点和各种华侨帮派的形成》，《南洋资料译丛》，1981年第3期，第86页。

66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续）》，《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第89-90页。

67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p. 40.

68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pp. 38, 39, 44.

69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pp. 37, 50.

70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p. 37.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网络

丘立本

战后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海外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就，使人们对海外华人经济网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东南亚现代华人网络的演变，并对近来国外传媒的有关议论提出自己的看法。

经济网络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民族如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和那里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古代和中世纪东方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建立过自己的商业网络。资本主义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网络日趋普遍。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从十九世纪初起，便逐渐将他们的经济网络扩展到全球各地。现代海外华人网络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中国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一百年里，中国人出国人数将近一千万，足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内部的天灾人祸有直接关系，也与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密切相关。就在中国移民大规模出国的同一时期，欧洲有近六千万移民涌向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印度也有三千万移民迁移至南亚、东南亚和南非一带。由此可见，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外迁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流动，是与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密切相关的。

由于旧中国经济落后、政府腐败，被资本主义洪流卷到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完全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助团体，和衷共济，团结自救。十九世纪初的中国还是个封建宗法社会，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然带着这种社会关系和传统的观念，依照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组织模式在移居地建立自己的新团体。中国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那里方言众多，彼此难以沟通，因此移民来到各移居地后便形成了以方言为基础的群体，即所谓的帮，并在帮内建立了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会馆）和宗亲会组织。东南亚华人中主要的帮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宗乡组织在海外华人中已十分普遍，仅新加坡一地就有姓氏宗亲组织60个，同乡会组织64个。这些宗乡组织成了早期华人经济网络的基础。

宗乡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怎么会成为华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网络的基础呢？这是因为，和国内的情况不同，这些组织是由被卷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中国移民，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而建立的，其主要成分是脱离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国际移民的地位和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往往使